

##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香港] 汪春泓

**摘要:**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关键词:** 《汉书》; 刘向; 刘歆; 班固

**中图分类号:** K234.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9)05-0040-13

按赵翼《陔余丛考》卷5《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说:“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sup>①</sup>这段话发人深省,对此应作出认真的回应。

纵观中国史学史,任何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均非一人一时之作,推之以常理,班彪、班固分属西汉末和东汉初的人物,若无凭藉,绝不能凭空杜撰,一部《汉书》,意味着承袭《太史公书》所叙汉朝开国迄武帝太初年间之旧事,再续接太初以来直至王莽的人和事,而试问何者能拥有《太史公书》及武帝朝之后的史料文献<sup>②</sup>? 思考班氏家学渊源及交游,似乎都指向了刘向、刘歆二人,刘氏父子当在其间发挥着关键要的作用,并且印证着赵翼所言,符合事实,绝非空穴来风。

西汉末期,以刘向、刘歆、扬雄、桓谭和班嗣、班彪以至王充等,形成了一个文士、学者集团。《汉书·叙传》说:“游博学有俊材,左将军史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游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

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游亦早卒,有子曰嗣,显名当世。”班游是班彪的伯父,他曾经“与刘向校秘书”,意指刘向所能见到的书籍,班游也同样可以阅读,而且他还得到当时朝廷许多秘籍,所谓“赐以秘书之副”,接着言“时书不布”及东平王求《太史公书》事,暗指《太史公书》等书籍属于“秘书之副”范畴之内,这些文献资料在当时属于机密,仅极少数人可以触及,而刘向与班游恰属于有幸能够阅读到这些文献的人;《汉书·叙传》又说:“穉生彪。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自幼与班游之子班嗣共砚席,故也颇有机会见到班游所收藏的文献资料,而此文献库大致是集合了刘向、刘歆及班游之所藏。因此,以刘、班为中心,散布开去,这些文献也成为其交游者的共享资源。

王充是班彪的门人,故《论衡》一书密集地引用了《太史公书》以及西汉末年以来不易知见的种种文献。王充《论衡·谢短》篇说:“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晓薄书;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闭闇不览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业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论者,而亦不能训之,如何?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无不能知者,短也。(刘先生曰:“无”字疑衍。)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

<sup>①</sup> 清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sup>②</sup> 《汉书·宣元六王传》说: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表示拒绝,这说明在西汉后期,若想一观《太史公书》并非易事。

收稿日期:2009-05-19

作者简介:汪春泓(1964—),浙江嘉兴人,文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供职于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sup>①</sup>王充在《论衡》许多篇中多谈及古与今的问题，上述文字透露这样的信息，当时的学风，由于现、当代史文献具有保密性，所以经生知识结构重乎经学，而对于史学，尤其是秦、汉近现代史，则茫然不晓；这样的学风属于“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经生虽知《五经》之微言大义，却不了解本朝所发生的大事，胸中探究着遥远的《春秋》是非，而对身边的政治现实却十分隔膜。而王充因在班氏那里接触到《太史公书》和其他关于前汉的文献史料，所以他强调士人应该“知今”，其实正体现了他在班氏那里改变和完善了知识结构的自负，《论衡·效力》篇说：“秦、汉之事，儒生不见，力劣不能览也。”《论衡·谢短》篇说：“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显然，兼通古今，令他自觉拔出于一般的读书人。

此亦反映出当时“知今”一派，局限于一个较小的文士圈子中。《论衡·定贤》说：“若典官文书，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论衡·超奇》说：“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所谓“抽列古今，纪著行事”，主要指结撰历史，王充唯独推许司马迁和刘向，他深知二者对于前汉史等方面的熟悉和贡献，堪称无与伦比且居功至伟！《论衡·超奇》说：“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近世刘子政父子、扬子云、桓君山，其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也；其余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对于刘向、刘歆以及扬雄、桓谭，比喻为文、武、周公并出一时，此实质上是本诸班彪、班固的观点。《汉书·叙传》载永平中，班固“感东方朔、扬雄目谕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为应焉。其辞曰：……近者陆子优繇，《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昔君之门闾，究先圣之壶奥，婆娑虐术艺之场，休息虐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虐圣听，列炳于后人，斯非其亚与！”两者所见几乎是一致的。

前汉终结于莽新篡政，莽新覆灭以后，降至后汉，若要为前朝修史，遇到了严重的禁忌和障碍，班固私撰《汉书》，以致被捕入狱，也折射出在东汉明、章帝朝，对编撰前朝历史，尚严格控制；无法

像东汉崩溃之后，史家撰写《后汉书》，呈现出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各家竞修，参差并存；后汉时期修撰国史，显得颇为微妙，它一定要被纳入到国家行为中去，这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当天降大任于班固时，其前期准备和师承，则对其撰写工作必然产生了殊为严重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与他所撰《汉书》的成就高下，关系甚密！

如何研究这种影响和关系？由于可以确信《论衡》的文献材料大多出自班彪，而班门的文献资料库则与刘向、刘歆之所藏，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或一致性，譬如《史记·孝景本纪》，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sup>②</sup>。而观《论衡》几乎不曾涉及景帝政事，此印证了王充所征引之《太史公书》，与此书曾被删削的情形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把《论衡》所涉及的前汉人物、事件，权且作为史料来对待，这种理解与以往仅把王充《论衡》视作思想史的材料，有很大的不同，会使《论衡》本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彰显出来。本文拟将《论衡》与刘向的作品《说苑》、《新序》、刘歆的作品《西京杂记》以及扬雄之《法言》并列，一并与署名班固《汉书》的各个部分作对照，借此来寻求班固《汉书》的继承性及其重心之所在，从而揭示出一部《汉书》是如何写成的，并由此而发覆一些历史的谜案。

## 一、围绕刘、班资料中心的文士集团之考订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乃使其外亲上变事”，其实是出自自家手笔，其文曰“仲舒为世儒宗”！《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前辈董氏无疑是他们的精神偶像，统计《论衡》论及董仲舒者约有30处之多，刘歆《西京杂记》大段文字引述董氏之论，而扬雄《法言》也有述及；作为前汉早期人物，陆贾也备受尊崇，《论衡》谈及者不下13处，这或许与王充借陆贾为南人张目的潜意识有关，刘向《说苑》、《新序》与刘歆《西京杂记》及扬雄《法言》也都叙述陆贾故事；至于刘向和刘歆父子，《论衡》则提及19次；刘向是扬雄的前辈，大约年长26岁，故对于自己的晚辈，刘向或许与扬雄并无交游，故其《说苑》和《新序》都不曾语涉扬雄；扬雄与刘歆年岁相若或稍长，而班彪比扬雄晚生56年，所以自刘向去世，扬雄则成为这一文士圈中的精神领袖，影响贯穿两汉之际，因此，

<sup>①</sup>《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黄晖撰，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sup>②</sup>《西京杂记校注》，刘歆撰，向新阳、刘克任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论衡》称美扬雄计有 21 处，而刘歆的《西京杂记》则也有 3 处叙及扬子云。

按《汉书·楚元王传》说：“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间；《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呼！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今之益友与！”标举孔子以后，儒家承传的关键人物，前汉之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堪称最杰出的代表，已经隐约凸显儒家道统在前汉的格局。署名班固所撰《汉书》，特为楚元王家族，尤其是刘向、刘歆立传，并为董仲舒、司马迁和扬雄单独立传，其实正表明了刘氏、班氏和扬雄、桓谭等人所组成的文士集团的精神谱系。《汉书·景十三王传》说：“赞曰：……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刘向《说苑》和刘歆《西京杂记》均记述了河间献王的嘉言懿行；体察《说苑》之《君道》和《臣道》篇<sup>①</sup>，都表明刘向虽身为宗正，但是其学术和思想立场却偏向孔儒本位，且能摒弃刑名法家之残酷，这也与汉初以来，尤其到景、武时大儒董仲舒等所持的反秦立场相一致的。因此，相较于董氏《春秋公羊学》，刘向、刘歆即使有《穀梁》和《左氏》之不同，但立身朝廷，俱借助于天象、祥瑞和灾异以讥讽、干预政治的方法，却与董氏如出一辙。

大约以汉武帝去世为分界，自武帝一朝上溯至汉初立国，其间人与事，署名班固之《汉书》基本上因袭《太史公书》，历代研究“班马异同论”者，都感觉班氏在引用《太史公书》时，其实是大段地抄录，几乎雷同，此是符合古书通例的<sup>②</sup>。《汉书·叙传》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其所谓“探纂前记，缀辑所闻”，就是处理、编辑和润饰公私所藏的诸如《太史公书》、刘向、刘歆杂著等<sup>③</sup>。《论衡·须

颂》说：“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扬雄位卑，他撰史的工作，想必也是从刘氏、班氏那里获取史料，或与刘、班相切磋，以成其事。《后汉书·班彪传》说：“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李贤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如今对署名班固《汉书》做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探索班氏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复杂关系，大致就可以分为：首先，明显的直接引用，譬如对《太史公书》，或者对向、歆杂著，等等，班氏《汉书》几乎就是不加掩饰地移植到自己文中；其次，比较隐秘的借鉴关系，譬如班氏《汉书》对于传主的遴选，这是至关重要的，班氏《汉书》在这个问题上，属于自出机杼，还是受他人之影响，这亦有待辨析，此关系到一部《汉书》是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了武帝身后到王莽覆灭时期的历史面貌；再次，在思想和学术上，班氏与当时思想界譬如扬雄等人的关系，也影响到史学家的史学观及人生观，自然也主宰着一部《汉书》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 二、署名班固《汉书》中刘向、刘歆之影子

《梁书·萧琛传》说：“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渡，惟赅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sup>④</sup>。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sup>⑤</sup>

《梁书·刘之遴传》说：“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

论》60篇、刘向所序67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扬雄所序38篇（《太玄》19、《法言》13、《乐》4、《箴》2）。

④ 有学者以为应做《汉书》、《序传》，此与僧人“惟赅一葫芦”相抵牾，还是应理解为“《汉书序传》”。然后，萧琛“固求得之”者，才是《汉书》。

⑤ 《梁书》本传记载，萧琛于天监元年出为宣城太守，但是很快就“徵为卫尉卿，俄迁员外散骑常侍”，所以萧琛获得古本《汉书序传》似应在天监元年或稍后。而按本传记载，鄱阳王萧恢与萧琛在荆州有交往，萧恢于梁武帝普通七年卒于荆州，世子萧范嗣于本年。按《南史》记述，萧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他“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故萧琛当于此时，投其所好，将古籍赠予萧范，萧范随后再进献于东宫，东宫多罕见之书籍。

① 《说苑校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② 参见余嘉锡著《目录学发微》（含《古书通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汉志》所列之《春秋》家中，包含陆贾所记《楚汉春秋》9篇、《太史公》130篇、冯商所续《太史公》7篇、《太古以来纪》2篇、《汉著记》190卷、《汉大年纪》5篇；在儒家中，则叙录了更多的前汉资料，譬如桓宽《盐铁

大略曰：‘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 37 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按刘之遴所叙“班固所上《汉书》真本”，其体例更加接近司马迁《史记》，此体现出班氏的写作意图十分明确，班氏目的就是要续写《太史公书》。

然而身为宗正，成帝朝，“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而其少子刘歆，“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算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刘氏父子是当时的文献大师，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有无撰写《汉书》的意愿？按刘向撰《新序》，其卷第 10《善谋下》，就已略显按照编年体例来叙述汉代开国史的意向<sup>①</sup>。然而，强烈的当代意识，加之以深重的《春秋》经学惯性，因此，刘向好借事以讽喻，令其所有作品，均呈现出浓烈的经学气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干扰了作为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客观叙事的态度，然而，其所关于前汉的丰富知识，对于人物的评价尺度和史料的编纂，却无疑大大沾溉了班氏之修史。

最为明显的，譬如《汉书》诸表，在《汉书·诸侯王表》中，首列“楚元王交”，他也正是刘向一系在汉朝的先祖，此启发我们，若按照刘之遴所具古今《汉书》之异状，若把今本《外戚》、《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还原到古本原来的位置，可以推知今本卷 36《楚元王传》，可能在古本《汉书》内是紧接着《宣元六王》之后的，换言之，《楚元王传》在全书中的位置，本体现出与外戚、各朝王子《传》并列的编撰者意向，

<sup>①</sup> 《新序校释》，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 2001 年。

这恰好可与《汉书·诸侯王表》相对应<sup>②</sup>。而此种位置安排，出自刘向高自位置的可能性为最大。

《汉书》之《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此八表（《古今人表》稍有例外）作为皇室内部秘档，刘向《新序》、《说苑》与刘歆《西京杂记》和王充《论衡》都无涉及，可以推测，当时刘氏杂著，若流布在外者，即使他们掌握八表的内容，也不便泄密，所以杂著当中均告阙如。然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宗正，秦官，掌亲属，有丞。”刘向身为宗正，他比班氏更有资格阅读和掌握这些档案材料，所以此八表出自刘向或刘歆的可能性极高。

而且由于“宗正”这一特殊的身份与战国末期楚国屈原相似，按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 11《考史》说：“王逸《注楚辞自序》云：‘屈原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土。’”<sup>③</sup>宗正与楚国三闾大夫的职责基本相同，因此，刘向意识中常常以屈原自况，在《汉志》中载录刘向祖父宗正刘辟彊赋 8 篇、刘向父亲阳成（成，似应作“城”——笔者按）侯刘德赋 9 篇、而刘向赋计有 33 篇之多，他们都站在宗正的立场上，模仿屈原，以抒发对于政治的批评，观刘向《逢纷》说：“抚招摇以质正，立师旷俾端词兮。命咎繇使并听，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余幼既有此鸿节兮，长愈固而弥纯。”从中可见刘向愿意像屈原一样，激浊扬清，他身负着强烈的社稷责任感，而此种天降大任式的社稷责任感，刺激着刘氏竭尽全力，以拓展其政治影响力，而刘氏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是发愤著述。

体现于《汉书》者，《汉书》之十志部分，显而易见，像《五行志》和《艺文志》主要出于刘向、刘歆之撰述。按《汉书·律历志》说：“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妙，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汉书·礼乐志》记述：至成帝时，刘向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篇末总结

<sup>②</sup> 按今本《史记》，其卷 49《外戚世家》第 19，紧接其后者，恰是其卷 50《楚元王世家》第 20。而此《楚元王世家》写得极其简括甚至零落，大致上仅仅叙述了《汉书·诸侯王表》中所列“楚元王交”一系的概况，此极有可能是经刘向整理《太史公书》时，将《汉书·楚元王传》所记述的刘德之前部分，经他有意篡改而孱入。

<sup>③</sup> 王应麟《困学纪闻》，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说：“今大汉继周，久旷大仪，未有立礼成乐，此贾谊、仲舒、王吉、刘向之徒所为发愤而增叹也。”《汉书·郊祀志》备述宣帝祥瑞。刘向曰：“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时。”“赞曰：……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皇帝下历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按《汉书·匡衡传》说：“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即使至成帝初年，匡衡对石显顺势反击，但是他依违于权势的品格已昭然若揭，在成帝朝，他与之前的贡禹、韦玄成一样，建议“罢诸淫祀”，尤其“罢郡国庙”，此举淡化甚至割断了当朝皇帝和刘姓祖先、宗族的关系，一朝天子仅与外戚共天下，然则在皇帝处理如何平衡先祖宗亲与外戚关系时，其重心倾斜到了宗亲一边，作为宗亲的刘向家族在权力结构中，势必被抛离中心地位，因此，刘向坚决抵制<sup>①</sup>；《汉书·五行志上》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旤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是以擎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所陈行事，迄于王莽，举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汉书·地理志下》说：“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此在最低限度而言，《汉书》十志，刘向、刘歆乃其撰述时的主要参照，至于祖述或因袭的程度究竟有多高，尚有待于进一步发覆。

《汉书》中关于淮南王一案，尤见刘氏之笔墨痕迹。淮南王刘安谋反事，纯属前汉的一大冤狱。景帝削藩，至武帝实行推恩令，诸侯藩国更加势单力薄，而元狩元年十一月，朝廷指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均被诛。个中缘由，不难窥见。《汉

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夏四月丁卯诏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淮南王招集门客，编撰《淮南子》等著作，还反对武帝的蛮夷政策，此在思想领域触怒了武帝，因此必须加以无情的整肃。《论衡·书解》说：“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自武帝朝以降，知其事者无不为之鸣冤。而在整治刘姓诸侯内部时，按照朝廷惯例，当由宗正主持治理，《汉书·楚元王传》记载：“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自此而下，楚元王子孙后代官居宗正职位者，代不乏人，刘向祖父辟疆、父亲刘德以及刘德长孙刘庆忌都身列宗正之位，在前汉，楚元王一系几乎是宗正世家。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元狩元年，宗正恰由刘受担任，而按《汉书·王子侯表上》所述，他是楚元王儿子沈猷夷侯刘岁的儿子，刘岁是刘向曾祖父刘富的弟弟。

《汉书·淮南王传》说：“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此宗正当然非刘受莫属，而《汉书·淮南王传》中却故意隐去其名字，此颇有为亲者讳的意思<sup>②</sup>。原因是此案株连甚广，数千人为之丧命，震动天下。故《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刘受的结局，说：“沈猷侯刘受为宗正，二年坐听不具宗室论。”语焉不详。《汉书·王子侯表上》颜师古注曰：“受为宗正，人有私请求者，受听许之，故于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获罪。”依然不明其获罪的细节。其实，刘受在主持办理淮南王案过程中，必然受命于武帝，滥杀无辜，血债累累。譬如《汉书·王子侯表上》说：“有利侯钉，城阳共王子，元狩元年，坐遗淮南王书称臣弃市。”刘受所知道的秘密太多，刘受手上所沾的鲜血亦太多，因此，武帝在借刀杀人之后，就马上把他弃置甚或杀之灭口了。

楚元王家族与此冤狱本难脱干系，因此，在《汉书》中如何叙述淮南王事迹，并且竭力淡化楚元王后人在此冤狱中的责任，此在今本《汉书》内，依然可以看出向、歆父子巧妙的处理手法。《汉书·楚元王传》描绘刘向父亲刘德，突出他“修黄老术，有智略”、“德宽厚，好施生”，相对于残酷的淮南王案，若以刘德此种个性，似乎与此血腥屠杀无涉；只是在叙述刘德儿子刘更生（向）时，才语涉“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枕中鸿宝苑秘

① 《汉书·五行传上》说：“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及水流杀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罢郡国庙，是岁又定迭毁，罢太上皇、孝惠帝寝庙，皆无复修，通儒以为违古制。刑臣石显用事。”此段话显然出于刘向之笔。而所谓“迭毁礼”，见《汉书·翼奉传》说：“其后，贡禹亦言当定迭毁礼，上遂从之。及匡衡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议皆自奉发之。”

② 由于楚元王后人遭际不同，故《汉书·楚元王传》在叙述元王得以封侯五子时，仅重点记述休侯刘富一系，至于其他四子之生平事迹则省略了；而关于刘富之子辟疆等四人，也仅凸显刘辟疆一脉，而不及其他，其间可能颇有避讳的考虑。此种所谓为亲者讳的史学理念其实将史家之道德良心大打折扣。

书》)”，此一则把刘德曾参与治淮南王冤狱事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似乎他仅是一局外人而已；二则亦透露刘德其人既参与其事，必深知其中原委，为揭示淮南王一案的冤情，身为宗正，理当具有史家的良心，刘氏叙述此案，则正体现当事者和见证人的可信性。由于淮南王冤狱实在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因此，《汉书》本传文字对在武帝指使下，直接铸成此一冤案的刘受、刘德并不叙述其具体作为，而是说在元朔六年，“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阴求淮南事而搆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深探其狱”。遂将肇始淮南冤狱的罪恶，归之于故辟阳侯孙和公孙弘，实际上，此二人岂敢如此大开杀戒！于是就帮武帝和身为宗正的刘受及其参与此案的刘德均开脱了罪责！

然而如何保持史家的正义感，除了在《汉书·淮南王传》中使用特殊的笔法，展示在武帝威权之下，当时所证成淮南王谋反者，全是莫须有的编造之词，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且为了进一步暗示淮南王一案纯属冤狱，《汉书》在《淮南王传》后，紧接着就是《蒯伍江息夫传》，此传中蒯通之与韩信、伍被之与淮南王、江充之与戾太子、息夫躬之与东平王，蒯、伍、江、息夫四者皆仲尼所谓“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四人均是利欲熏心胆大包天之险士，其生平都与前汉一桩人神共泣的冤案相联系，而此传不置于韩信、戾太子及东平王传后，唯独列于淮南王传后，其意指太明确不过了，显然，史家的安排在于说明淮南王一案与韩信、戾太子等一样，同属遭致陷害的千古奇冤。

而细察此种史家的笔法和布置，既消除了作为宗正的刘氏家族在此案中的罪责，又保留了淮南王案真相的信息，草蛇灰线，陈仓暗渡，堪称一举两得的史家手段。而这样处心积虑的笔法考量，若出自于当事者家人的刘向之手笔，那就十分容易理解；相反，若认为是班氏的煞费苦心，则缺乏为刘氏遮蔽某些真相的用意及理据，故将《楚元王传》、《淮南王传》及《伍被传》三者联系起来看，无疑是出自刘氏精心的谋篇布局。

刘向《说苑》、《新序》和刘歆《西京杂记》都已出现记述前汉中后期人物的文字，它们自然早于《汉书》，可以视为《汉书》汲取了刘氏父子的劳绩，再踵事增华，以成今本《汉书》各传的面貌。譬如《汉书》之《杨王孙传》、《胡建传》、《于定国传》、《路温舒传》、《枚乘传》、《河间献王传》、《主父偃传》、《吾丘寿王传》、《丙吉传》、《夏侯胜传》和《说苑》的记叙相对照；《汉书》之《韩安国传》、《主父

偃传》、《苏武传》与《新序》相对照；《汉书》之《昭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梁孝王传》、《枚皋传》、《景十三王传》、《司马相如传》、《公孙弘传》、《司马迁传》、《武五子传》、《朱买臣传》、《东方朔传》、《朱云传》、《杨王孙传》、《霍光妻传》、《傅介子传》、《赵广汉传》、《匡衡传》、《杜邺传》、《何武传》、《王嘉传》、《扬雄传》、《五鹿充宗传》、《游侠传》、《外戚传》、《佞幸传》、《两粤传》等与《西京杂记》相对照，必然会发现，原来《汉书》的纪传各篇，均或多或少地取材于刘向、刘歆的著述，刘氏父子已经为《汉书》相关人物的编写提供了蓝本。《西京杂记》第3《辨〈尔雅〉》说：“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此《外戚传》今人已不明其原貌，但是也可能已有记述前汉外戚事迹的单篇文字存世，其属性也应归诸于皇室内部秘档，刘氏父子可以见到，亦或许为后之史家所采纳。

《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说：“赞曰：自孝武置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而吏民为之语曰：‘前有赵、张，后又三王。’然刘向独序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冯商传王尊，扬雄亦如之。”此透露出，将赵广汉、尹翁归、韩延寿同传，应是刘向的安排；

《西京杂记》第3《何武葬北邙》说：“何武葬北邙山薄龙坂，王嘉冢东北一里。”按《汉书》中，何武和王嘉同传，《西京杂记》已经体现出此二者紧密的关系；《汉书·景十三王传》说：“赞曰：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沈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这对照《说苑》，在景帝诸子中，刘向独表河间献王一人，可知《汉书》完全秉承了刘向的观点。《汉书·李广苏建传》说：“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而按刘向《新序》卷第7《节士》更早表彰了苏武作为使者的节义精神，《汉书》本传显然与此有承袭的关系，并且对刘向在《新序》中的苏武事迹加以精心改造，成为其《汉书》中十分重要的《苏武传》；《汉书·董仲舒传》说：“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笮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能为当

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筮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汉书·贾谊传》说：“赞曰：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与赞美董仲舒相似，因贾谊也属于其精神谱系中人物，所以亦称他“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司马迁传》说“赞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韦贤传》说：“韦贤字长孺，鲁国邹人也。其先韦孟，家本彭城，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孙王戊。”内有刘歆赞美武帝，鼓吹向外扩张的言论。文末赞曰“司徒掾班彪曰：汉承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皆数复，故纷纭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义异制，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观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刘氏父子的观点多为《汉书》叙述确定基调，具有指导的意义。

张汤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寄托了司马迁无比的痛恨！但是其子张安世辅佐昭、宣，在武帝死后，对于安定汉朝功勋卓著，作为同僚的刘向亦感其功德，这决定了对张汤的功过判断，势必出现不同于司马迁的声音。所以，《论衡·程才》说：“张汤、赵禹，汉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论衡·定贤》说：“盖世优者，莫过张汤，张汤文深，在汉之朝，不称为贤。太史公《序累》以汤为酷，酷非贤者之行。”此都表明，在司马迁之后，由于刘向的评价与司马迁不同，导致《论衡》远绍刘说，对张汤亦褒多贬少，而体现在《汉书·张汤传》里，关于张汤部分，基本上抄袭《史记》本传，而关于其子孙，则基本给予正面的评价。其赞曰：“冯商称张汤之先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汉兴以来，侯者百数，保国持宠，未有若

富平者也。汤虽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安世履道，满而不溢。贺之阴德，亦有助云。”所以《汉书》特为张汤设专章以列传，尤其指出“其推贤扬善，固宜有后”，显别于《史记》，此亦明显为刘向使然。《汉书·东方朔传》说：“赞曰：刘向言少时数问长老贤人通于事及朔时者，皆曰朔口谐倡辩，不能持论，喜为庸人诵说，故令后世多传闻者。”为东方朔立传，亦与刘向等人对其重视有关。

因此，刘向、刘歆在《汉书》中明显的印迹，是不胜枚举的，班固在撰写《汉书》中，确实如葛洪所言，对于刘氏父子颇有借鉴，刘氏父子为班氏父子的著述其实提供了撰史的基础。

### 三、署名班固《汉书》中重要传主的遴选与刘氏父子的关系

署名班固撰《汉书》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于上述明显的因袭现象，而是此《汉书》传主的遴选，大受刘向、刘歆的影响，而刘氏在决定谁入传、谁不入传的问题时，太注重人物与自己和家庭的关系，这些人物或利益攸关，或不共戴天，于是敌、友入传，或歌功颂德，或贬斥泄愤。而这种多以刘氏家族为中心来遴选传主的方式，到前汉末和后汉初，离前汉渐远，班氏已缺乏清醒的判断力，所以仍以刘氏马首是瞻，并不敢越其雷池半步，使其所撰写的《汉书》在客观全面和公正性上均存有疑虑。

读《汉书》，当以《楚元王传》为纲，刘向活跃于宣、元、成帝三朝政坛，他与他的父亲刘德一生所经历的大事件，包括有：第一、在霍光立昭帝后，霍光与上官桀、桑弘羊等人的联盟破裂，身为宗正的刘德帮助霍光治上官氏、盖主一案。表明刘德当时站到了霍光一边；第二、参与立宣帝，《汉书·霍光传》说：“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轝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这是刘氏家族在前汉走向显赫的起点<sup>①</sup>；第三、刘德反戈一击，协助宣帝在霍光身后铲除霍氏余势，按《汉书·外戚恩泽侯表》

① 《汉书·楚元王传》说：“昭帝即位，或说大将军霍光曰：‘将军不见诸吕之事乎？处伊尹、周公之位，摄政擅权，而背宗室，不与共职，是以天下不信，卒至于灭亡。今将军当盛位，帝富春秋，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如是则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择宗室可用者。”刘辟疆和刘德父子因此受到重用，尤其在助立宣帝之后，“宗室以（刘）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宗室顿成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记述，宣帝地节四年乙卯三月，封刘德为阳城侯，而至本年七月，宣帝就以霍氏谋反为藉口，诛灭霍氏，可见刘德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第四、元帝朝，刘向与萧望之、周堪等一道，和代表许、史外戚势力的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展开殊死的斗争；第五、成帝朝，外戚王氏秉政，刘向特撰《洪范五行传论》以表讥讽；由于“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且“政由王氏出”，所以刘向忧心忡忡，遂上封事极谏曰：“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第六、成帝朝，营造皇陵，奢侈无度，刘向上谏反对厚葬。这些事件虽然可以称得上是前汉武帝身后的重大政治斗争，然而，必须看到，刘德、刘向和刘歆亦并非是完全从儒家道统出发，来为民请命、仗义执言的，《汉书》本传说：“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疆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他代表的是刘氏宗亲一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以刘氏不遗余力地与外戚分庭抗礼，从某种程度上看，实际上是刘氏诸侯和皇帝外戚的利益较量。《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说：“窃闻故前将军萧望之等，皆忠正无私，欲致大治，忤于贵戚尚书。”此言将自己和萧望之等人与“贵戚尚书”对立的局面揭示无遗；而弘恭、石显查明此书为刘向所为，“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此所言之“亲戚”乃外戚之谓也，刘向一生堪称刘氏宗亲利益的代言人，当然更是自家利益的捍卫者，其言行无不与此种身份立场相关联。

作为崛起于霍光执政时期的家族，就必须维护昭帝和霍光本人的合法性，否则，揭示真相，假如昭帝所出之本身就极为可疑，那么，前汉国祚难道断绝于武帝之死？然则作为联手结盟者的刘氏，其所作所为，也就属于乱臣贼子、大逆不道了。所以宗正刘氏就必须为之证明，昭帝之立，乃出自武帝的心意，毋庸置疑！而且，昭帝身后，昌邑王始立终废，也是天经地义的；甚至于霍光死后，家族覆灭，更是咎由自取、势所必然。《论衡·别通》说：“孝武皇帝时，燕王旦在明光宫，欲入所卧，户三尽闭，使侍者二十人开户，户不开，其後旦坐谋反自杀。夫户闭，燕王旦死之状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闭塞为占。”《西京杂记》第3《广陵死力》说：“广陵王胥有勇力，常于别囿学格熊。后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绝脰。后为兽所伤，陷脑而死。”对照《汉书·天文志》说：“孝昭始元中……后荧惑出东方，

守太白，兵当起，主人不胜。后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法曰‘国恐，有诛’。其后左将军桀、骠骑将军安与长公主、燕刺王谋乱，咸伏其辜。”《汉书·五行志上》说：“昭帝元凤元年，燕城南门灾。刘向以为时燕王使邪臣通于汉，为谗贼，谋逆乱。南门者，通汉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来，为奸谗于汉，绝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说：“昭帝元凤元年，有鸟与鹊斗燕王宫中池上，鸟堕池死，近黑祥也。时燕王旦谋为乱，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意指武帝有成年的五子，他们即使在年龄上比仅8岁的昭帝更具继位的资格，也更合乎武帝选择继承人的逻辑性，但是上述种种灾异预示着他们都不得善终，而帝位自然唯昭帝者莫属也！

如何处置昌邑王，是霍光面对的一个难题，怎样在舆论上加以解决？莫若以昌邑王自身流露的种种恶德败相来解释，最具说服力。亦从下表可以看到，《论衡·遭虎》说：“昌邑王时，夷鹠鸟集宫殿下，王射杀之，以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对曰：‘夷鹠野鸟，入宫，亡之应也。’其後昌邑王竟亡。”《论衡·商虫》说：“昌邑王梦西阶下有积蝇矢，明旦召问郎中龚遂，遂对曰：‘蝇者，谗人之象也。夫矢积於阶下，王将用谗臣之言也。’”《汉书·天文志》说：“（元平元年）二月……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见，祸无时，臣运柄。群云为乱君。’”到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辟，立二十七日，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昭帝时，昌邑王贺遣中大夫之长安，多治仄注冠，以赐大臣，又以冠奴。刘向以为近服妖也。”王充和班固不可能捏造这些记载，此出自当时与霍光命运利益共同体的刘向可能性最大。按《论衡》对前汉各帝的记述，除了汉高祖之外，看得出其重心落在了宣帝身上<sup>①</sup>，所谓“汉宣中兴”与刘氏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由于刘氏家族对宣帝感恩戴德，所以《论衡》之“宣汉”，是把后汉的明帝朝与前汉的宣帝朝并列的，而对前汉宣帝时期种种祥瑞的渲染，其实出自刘氏，这是显而易见的，而要为宣帝的天授神与之合法性大张旗鼓，然则树立昭帝，贬斥昌邑王，自然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了。

<sup>①</sup>《论衡·指瑞》说：“孝宣皇帝之时，凤皇五至，麒麟一至，神雀、黄龙，甘露、醴泉，莫不毕见，故有五凤、神雀、甘露、黄龙之纪。使凤、麟审为圣王见，则孝宣皇帝圣人也；如孝宣帝非圣，则凤、麟为贤来也。为贤来，则儒者称凤皇、麒麟，失其实也。凤皇、麒麟为尧、舜来，亦为宣帝来矣。夫如是，为圣且贤也。儒者说圣太隆，则论凤麟亦过其实。”

前汉末年，扬雄《解嘲》说：“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对于霍光的功绩，曾经作为霍光的同盟者，刘德、刘向等自然并不完全否认，但一旦霍光势大，甚至一手遮天，其权势凌驾于皇权之上，刘氏宗室的权益也被边缘化，此时与皇室沾亲带故的刘德、刘向绝对不能容忍。《汉书·王商传》记载在元帝时，蜀郡张匡之对曰：“自汉兴几遭吕、霍之患。”此说明霍光家族专权，到元帝时，其危害性竟然被渲染到与吕氏相仿佛的地步。而此前当霍光死去，顺势推倒霍氏家族，扫清权力的障碍，剿灭霍家，亦成为刘氏家族与宣帝共同的愿望。

《汉书·五行志上》说：“元凤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庙正殿灾。刘向以为孝文，太宗之君，与成周宣榭火同义……是岁正月，上加元服……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于周公，上既已冠而不归政，将为国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灾见。”霍光大权独揽，刘向早已不能容忍；《论衡·变动》说：“霍光家且败，第墙自坏。谁哭於秦宫，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门崩墙坏，秦、霍败亡之征也。”《说苑·权谋》说：“孝宣皇帝时，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则不逊。’夫不逊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权，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书言：‘霍氏奢靡，陛下即爱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于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果灭。董忠等以其功封。”<sup>①</sup>而《西京杂记》第1《霍显为淳于衍起第赠金》说：霍光妻遗淳于衍奢侈品无数，衍犹怨曰：“吾为尔成何功，而报我若是哉！”指淳于衍帮助霍光妻害死宣帝皇后之事。这些文字意在为铲除霍家势力营造声势，作出铺垫，并且向社会作出解释，便把血淋淋的朝廷斗争归于天命，即使再惨烈也令世人觉得霍氏命该如此，甚至罪该万死。联系《汉书·天文志》说：“（宣帝地节元年）其丙寅，又有客星见贯索东北，南行，至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东南指，其色白。占曰：‘有戮卿。’一曰：‘有戮王，期皆一年，远二年。是时，楚王延寿谋逆自杀。四年，故大将军霍光夫人显、将军霍禹、范明友、奉车霍山及诸昆弟宾婚为侍中、诸曹、九卿、郡守皆谋反，咸伏其辜。’”《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宣帝时，大司马霍禹所居第门自坏。时禹内不顺，外不敬，见戒不改，卒受灭亡之诛。”《汉书·五行志下之下》说：“宣帝地节元年正月，有星

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刘向以为太白为大将，彗孛加之，扫灭象也。明年，大将军霍光薨，后二年家夷灭。”这些记述桴鼓相应，其实是把霍光一生及其家族的盛衰作了一个了结。

但是对此凶险的斗争，却大致上出于此中的既得利益者刘氏的叙述，作为始作俑者，其片面甚至虚假都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当时许多历史的真相都没湮灭于其叙述之中了，真令人有“尽信书，不如无书”之叹！径跨昭、宣、元、成四朝，其历史难道仅仅是这些利益纷争吗？历史本身远比这些人、事要丰富和复杂，但是在刘氏视野中，所谓历史也就是其家族的兴亡成败史，甚至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其史学眼光未能超越其家族的遭际，厕身于当时利益纠葛之中，刘向亦不难免俗，这令他局囿其中而不能超拔，这对于一个史家而言，正是极大的缺陷。

于是如何遴选人物入史传，就必然地带有刘氏父子的主观性。《汉书·霍光传》记载霍光借太后之名义，废黜昌邑王，他与群臣连名上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马大将军臣光、车骑将军臣安世、度辽将军臣明友、前将军臣增、后将军臣充国、御史大夫臣谊、宜春侯臣谭、当涂侯臣圣、随桃侯臣昌乐、杜侯臣屠耆堂、太仆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农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乐成、廷尉臣光、执金吾臣延寿、大鸿胪臣贤、左冯翊臣广明、右扶风臣德、长信少府臣嘉、典属国臣武、京辅都尉臣广汉、司隶校尉臣辟兵、诸吏文学光禄大臣迁、臣崎、臣吉、臣赐、臣管、臣胜、臣梁、臣长幸、臣夏侯胜、太中大夫臣德、臣印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这是废黜昌邑王时，霍光联手或要挟的同盟者名单，以此反观刘向《新序》，其中写到的最晚近的当代人物是苏武。前已述及，刘向《新序》卷第10《善谋下》大致上是一部简明的前汉开国史，它写到武帝朝就戛然而止。而苏武是在昭帝即位后，于始元六年春至京师，在刘向《新序》中，他出现于卷第7《节士》之29则《苏武章》，除《新序》卷第10《善谋下》之外，苏武是《新序》全书中唯一出现的前汉人物，故颇具特殊性。《汉书·苏武传》说：“数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为遗言。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甘露三年，单于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图画其人于麒麟阁，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马大

<sup>①</sup> 《说苑校证》，刘向撰，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将军博陆侯姓霍氏，次曰卫将军富平侯张安世，次曰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次曰后将军营平侯赵充国，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阳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阳城侯刘德，次曰少府梁丘贺，次曰太子太傅萧望之，次曰典属国苏武。皆有功德，知名当世，是以表而扬之，明著中兴辅佐，列于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传。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归翁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赞曰：……孔子称‘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苏武有之矣！”<sup>①</sup>两段文字相对照，废黜昌邑王，与立宣帝，这在刘向心目中是前汉极其重大的政治事件，署名班固《汉书》的重心也被这种观点左右了。上述前后两份名册相比较，发现政局又变，霍光倒台，但是其中大多数人物审时度势，经受住风浪的颠簸，成为捍卫皇室的功臣。按《汉书·张汤传》附《张安世传》叙述皇曾孙幼孤，张安世兄张贺“所以视养拊循，恩甚密焉”，在宣帝心中，张安世远比霍光亲近；车骑将军龙额侯韩增即共同署名废黜昌邑王之“前将军臣增”也；按《汉书·赵充国传》说：“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据《汉书·魏相传》叙述，可知魏相有助于宣帝亲政；而从《汉书·丙吉传》中可以看到，丙吉曾经保护和抚养卫太子孙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后又参与了尊立皇曾孙之事，功不可没，以致宣帝为报恩，封之为丞相<sup>②</sup>；《汉书·杜延年传》说：“延年知曾孙德美，劝光、安世立焉。”《汉书·刘德传》说刘德“与立宣帝”；《汉书·儒林传》说梁丘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他是宣帝十分相信的“风水师”；《汉书·萧望之传》记录萧望之上疏，鼓动宣帝在霍光身后，消除霍氏余势。上述人物之事功，其重点不在国而在君，此辈在宣帝落难时挺身保护、在宣帝继位前参与谋立，并且在宣帝与霍氏斗争中给予坚定的支持，故而有资格图画于麒麟阁且在署名班固的《汉书》中亦是重点人物，备受关注。而宗正阳城侯刘德列名其间，这是刘氏家族的巅峰时刻，堪称铭心刻骨！在麒麟阁画图人物中，苏武虽忝陪

末座，但意义深远<sup>③</sup>。同时，上文所谓“自丞相黄霸、廷尉于定国、大司农朱邑、京兆尹张敞、右扶风尹归翁及儒者夏侯胜等，皆以善终，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于名臣之图，以此知其选矣”。意指关于图画麒麟阁的标准，作者于宣帝尚存在着些许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像黄霸、于定国、朱邑、张敞、尹归翁及夏侯胜等6人，不能跻身于麒麟阁，实属憾事。发表这样的意见，绝非是班固之观点，而是出自向、歆之私见，原因就是这些人物与刘氏比较接近，且有利益之攸关。读《汉书·魏相丙吉传》说：“赞曰：……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认为魏相、丙吉可与萧、曹相比肩，其实比较二者之功绩，真所谓霄壤之别，而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比附，原因在于把辅佐宣帝的功勋夸大了，而之所以夸大这种功勋，原因就在于其始作俑者之本人或家族在宣帝一朝获益良多，而持这样立场的史学家，则非刘氏莫属者也。

而在《汉书·苏武传》中，图画于麒麟阁之11人，再加上刘氏赞赏的6人，总共17人之所以成为重要的传主，当属刘向的规划。而另外，刘向将自己与中书宦官弘恭、石显等斗争的意义夸大了，于是以此为准衡，划出了坚决参与斗争者，宣、元时期有萧望之和周堪一系，成帝朝的翟方进、谷永等，萧、周是刘向志同道合者，《汉书·萧望之传》说：“初，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律，而中书宦官用事。”中书宦官弘恭、石显代表着许、史外戚的势力，而外戚势大，则会令刘氏宗亲权益受损，作为刘氏权益代表者的刘向与之斗争，甚或放言无忌，元帝要平衡刘氏和外戚二者的力量，大多时候都能包容刘向的言论，刘向言行与捍卫公平正义不可等量齐观；而后之翟方进，按《汉书》本记载，“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颜注：“如淳曰：‘刘歆及田终术二人皆受学于方进。’”按《论衡·案书》说：“《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真、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此说明刘氏父子的学术和翟方进相近，而且

①《论衡·须颂》说：“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於画上者，子孙耻之。何则？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按《汉书》所谓的“凡十一人”，是否包含图画于麒麟阁的全部人物，十分可疑，其所选取的十一人，标准太过单一了。

②《汉书·外戚传》对此另有叙述，然而，“丙吉”却作“邴吉”，亦不一致。

③ 参见拙作《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翟方进身为刘歆的老师，虽然日后翟方进的儿子翟义挺身而出反抗王莽执政，刘歆却依附于莽新政权，两家最终分道扬镳，但是，《汉书·翟方进传》对于翟氏内心如此精微的把握，显然不是班氏可以办到的，其出自曾经亲近翟氏的刘歆所叙述的可能性则更大。萧、翟在《汉书》中特被专章叙录，且与依违朝廷两股势力之间首鼠两端的匡衡、张禹等一系，还有其对立面，像弘恭、石显，都在《汉书》中占据了太过重要的篇幅，甚至连《法言·先知》说：“或问曰：‘载使子草律。’曰：‘吾不如弘恭。’‘草奏。’曰：‘吾不如陈汤。’曰：‘何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刻。’”<sup>①</sup>扬雄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汉书·匡张孔马传》说：“赞曰：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蕴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班固看清楚他们自私自利的本质，将这些在前汉以儒宗居宰相位者，一并加以挾伐，但是他却忽视了刘氏对这些人物尚有亲疏之别，譬如匡衡和张禹有时故意讨好外戚，刘氏虽然肯定其经学造诣，但是对其言行却至为不满，因为他们危及和损害刘氏宗亲的利益，在刘氏意识中，萧望之、翟方进与匡衡、张禹等，尚不可同日而语，班固上述所谓“赞曰”，显然违背刘氏初衷，但是《汉书》依然一仍刘氏所定之体例和人物，于是产生了明显的矛盾；而成帝朝，谷永亦上疏谏厚葬，谷永与杜邺都有抵制外戚的言论，此二者参与到朝中各种势力的倾轧之中，本身虽俱有投机的品格，由于刘向、刘歆视之为同道，也被《汉书》纳入同传，并大书特书，这就简直把国史当作家传来书写了<sup>②</sup>。无怪乎《汉书》本传之“赞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诸舅持权，重于丁、傅在孝哀时。故杜邺敢讥丁、傅，而钦、永不敢言王氏，其势然也……可谓谅不足而谈有余者。孔子称‘友多闻’，三人近之矣”。而这样的钻营者竟然也在《汉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认为是刘氏的选择和安排。成帝朝，由于赵飞燕姊弟受成帝专宠，刘氏和班氏都是受害者，《西京杂记》第2《赵后淫乱》说：“庆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赵后悦之，

白上，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着轻丝履，招风扇，紫绋裘，与后同居处。欲有子，而终无胤嗣。赵后自以无子，常托以祈祷，别开一室，自左右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辎车载轻薄少年，为女子服，入后宫者日以十数，与之淫通，无时休息。有疲惫者，辄差代之，而卒无子。”刘、班对赵氏姐妹恨之入骨，于是赵氏就被刻画成一个飞扬跋扈的女子，尤其传中借解光之口，揭露其累累罪行，并且夸大了她确立定陶王为成帝继承者的作用。这是刘、班联手的杰作，几乎把前汉走向王莽篡权的罪责之很大一部分都推给了赵飞燕，暗合女宠祸水之窠臼。

考察刘向家族的境遇，在宣帝朝由于特殊的风云际会，刘德受宠，楚元王一系的家族至为得势，而到元帝和成帝时期，因为二帝倚重外戚，刘向等刘氏宗亲被冷落了，且明显有所失势，而作为既得利益者，向、歆父子是绝不会甘心的，他们必然会作出抗争。因此观《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的一系列撰述，均意在攻击外戚，元帝朝，刘向与外戚势力作殊死的较量，自身仕途也因此而跌宕沉浮，但他还是奋不顾身地上封事谏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臣幸得托肺附”，他自恃“散骑宗正给事中”的身份，所以敢于放言无忌。然而所借重于《春秋》经传者，矛头所指，目标明确，惟在外戚。《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元帝）永光中，有献雄鸡生角者。京房《易传》曰：‘鸡知时，知时者当死。’房以为已知时，恐当之。刘向以为房失鸡占。鸡虽小畜，主司时，起居人，小臣执事为政之象也。言小臣将秉君威，以害正事，犹石显也。竟宁元年，石显伏辜，此其效也。一曰，石显何足以当此？……”刘向以自然界事物比附政治，由于自己陷入斗争漩涡至深，所以含沙射影，几乎草木皆兵，并不避忌指鹿为马，竟把一切怪异现象都比附于政敌，此令他人亦感诧异，一只生角的雄鸡与石显其人怎么会有关系？但是此人把此鸡与“王氏之权自凤起”联系起来，似乎更上纲上线到整个政治乱象，亦足见当时抗衡外戚专权的呼声，代表着当时社会较广大阶层的心愿，此乃由汉代政治结构所铸成的矛盾纷争，此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刘向不屈不挠地抗拒外戚势力，也与此普遍心愿相呼应，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正当性，由此激发他对外戚作出更决绝的抨击。而分别作为宗亲及外戚、佞幸两股势力的代表人物，无论妍媸，不计是非，皆缘于刘向心目中太在意此种角力，而被过度地凸显和放大，刘向此种激烈的反外戚势力的情结反映到《汉书》之中，

① 《法言义疏》，汪宝荣撰，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② 《论衡·超奇》说：“观谷永之陈说，唐林之宣言，刘向之切议，以知为本，笔墨之文，将而送之，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将谷永和刘向并列，其实承袭了刘向推崇谷永的观点。

必然会影响到《汉书》的史学成就。

譬如《史记·外戚世家》所叙述者起于吕后，大体上止于李夫人，后者则为褚先生所添补。计太史公所叙述者，篇幅较小。而相对于《汉书·外戚传》，一则由于时跨整个前汉各朝，二则由于外戚与刘、班均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汉书·外戚传》的规模就大大地拓展了，《汉书·楚元王传》和《汉书·外戚传》相对照，一经一纬，一正一反，所传之人物，其实正是在刘氏宗室和外戚斗争的线索上凸显出来，沿波讨源，沿根讨叶，几乎所有传中人物都和这条线索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书·外戚传上》述及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等皆遭害，“史皇孙有一男，号皇曾孙，时生数月，犹坐太子系狱，积五岁乃遭赦。治狱使者邴吉怜皇曾孙无所归，载以付史恭。恭母贞君年老，见孙孤，甚哀之，自养视焉。后曾孙收养于掖庭，遂登至尊位，是为宣帝。而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旧恩封。长子高为乐陵侯，曾为将陵侯，玄为平台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阳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丹左将军，自有传。”同传又说：“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故史，是宣帝祖母家之姓也；同传又说：“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故许，乃元帝母家之姓也。尚在危难之中，皇曾孙也即后之汉宣帝娶许广汉女为妻，《汉书·宣帝纪》称“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此均为宣帝即位以后，史高及许、史氏侍中者恃宠弄权埋下隐患。前述弘恭、石显“劾更生前为九卿，坐与望之、堪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毁离亲戚，欲退去之，而独专权”。此说明宣、元二帝情系外家，宣帝与之曾经共处患难之间，虽然亦须平衡刘氏宗亲和外戚的关系，然而孰轻孰重，宣、元二帝心中的天平自然会倾斜到外戚一边，刘氏宗亲则往往被疏远了。到元帝继位后，一仍此种政治格局，且变本加厉，此导致刘向严重的不满，他要代表刘氏宗亲以维护权力分配之均势，于是以刘姓诸侯自居，与新贵之许、史及王氏展开博弈。

《汉书》在《外戚传》之外，专列《元后传》，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而王凤、王崇与她是同母兄弟，异母兄弟则有王商、王谭、王根等。元帝末年，王凤与皇后及侍中史丹等一起“拥右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汉成帝。此时，“王氏之兴自凤始”，《元后传》记述一事以显示王凤权威，其传曰：“大将军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颡。左右常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说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

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其见惮如此。”此必然加剧刘氏宗亲一系对王氏专权的愤恨，两者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刘歆《西京杂记》多有记录佞幸、外戚丑闻者，确是有感而发。而此间，由于元后享年八十四岁，“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馀载”，她偏袒王凤等，以致王家“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最终助成王莽篡汉，其咎难辞。对于与外戚专权相关联的政治人物，按《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所记录的三位人物的生平，亦可折射出外戚政治的某些实际情形。王商与王凤属异母兄弟，同为外戚，然而二者之间也发生权利的纷争，其内讧最后以王商败北而告终。《汉书·王商史丹傅喜传》说：“赞曰：自宣、元、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贵极富，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阳平之王多有才能，好事慕名，其势尤盛，旷贵最久。然至于莽，亦以覆国。王商有刚毅节，废黜以忧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继，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辅导副主，掩恶扬美，傅会善意，虽宿儒达士无以加焉。及其历房闼，入卧内，推至诚，犯颜色，动寤万乘，转移大谋，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无言不讎’，终获忠贞之报。傅喜守节不倾，亦蒙后调之赏。哀、平际会，祸福速哉！”既指出“见其位矣，未见其人也”，意谓此辈皆利欲熏心之徒，岂止乏善可陈，甚或祸国殃民，然则引之入传，其历史价值本身就令人疑惑。但是王商敢于制衡王凤，所以在刘向、刘歆心目中，就具有了正面的光辉；而史高、史丹在刘向看来，史氏父子属于政敌一方，他“谋排车骑将军高、许、史氏侍中者”，两者敌友分野是明晰的。即使史丹“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然而其用心无非出自私利，而且所拥立的成帝根本算不上什么出色的皇帝，刘向、刘歆若为史丹立传，定当贬多褒少；而班固则由于班婕妤的缘故，班氏在成帝朝一显风光，因此班氏肯定了其定立成帝的功绩；傅喜亦同样因身为外戚，而知所进退，节制外戚权力欲望之膨胀，而成为外戚之中全身远祸之士。反观其人入选《汉书》，无非是缘于他们与外戚势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班氏其实对此已不甚了解，而刘向、刘歆则明察秋毫，所以其出现于《汉书》中，当亦属于向、歆父子的安排，但是在本传具体的写作中，班氏亦掺入了其主观的评价；按《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所记述的盖宽饶、诸葛丰、刘辅、郑崇、孙宝、毋将隆和何并，其人大多不畏外戚得势者，危言直行，这便是此辈留名青史的缘故；再按《汉书·杜周传》，

杜周本为一凶残的酷吏,但是其少子杜延年却在昭、宣二朝,辅助霍光秉政,并且在霍氏覆灭之后,尚能不为牵连。杜延年的儿子中杜钦最具政治天赋,善于平衡王凤和其他政治势力,《汉书》本传称他“当世善政,多出于钦者”,可见其手腕之圆熟;杜延年另一子杜缓是杜钦的兄长,他有一子杜业,在哀帝朝,上书言:“王氏世权日久,朝无骨鲠之臣,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此当深得向、歆父子之心;《汉书》本传说:“赞曰: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而俱有良子,德器自过,爵位尊显,继世立朝,相与提衡……及钦浮沈当世,好谋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陈女戒,终如其言,庶几乎《关雎》之见微,非夫浮华博习之徒所能规也。”对照刘向于成帝朝,编辑《列女传》,以戒天子,两者用心一致。因此杜氏四代入《汉书》传中,主要是因为杜业等反外戚的倾向,向、歆引以为同道,班氏则因循刘氏的初衷而已。

苏洵《广士》说:“昔者汉有天下,平津侯、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而卒不能为汉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绝隽伟,震耀四海者,乃其贤人之出于吏胥中者耳。夫赵广汉,河间之郡吏也;尹翁归,河东之狱吏也;张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书佐也。是皆雄隽明博,出之可以为将,而内之可以为相者也。”<sup>①</sup>其实一部史书,为帝王将相立传,这倒并无怪异之处,而为某些名不见经传且乏善可陈者刮垢磨光树碑立传,其间确有可深思的地方。这些人物难道有什么丰功伟烈值得载入史册吗,其实,

说穿了,他们不过因为与刘氏发生因缘,使得他们有幸成为《汉书》中的人物,班氏撰写《汉书》,若在人物遴选上未能另起炉灶,其史学成就,终归大打折扣。

依照上述推论,是否要贬低班氏在《汉书》中的劳绩呢?按王充《论衡·对作》说:“《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认为司马迁、刘向和班彪三者具有一致之处,都属于“述”的范畴。然而,《论衡·超奇》说:“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浹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坚为尚书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鲁、卫之谓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纪也。”他作为见证人,还是看到了班氏的贡献,班彪所作,似乎是把刘向、刘歆所留存的文献材料更加完备化,使得传主事迹叙述具备了起承转合的层次感,也即范曄在《后汉书·班彪传》中所谓“固文赡而事详”,其叙事更加条理分明,具体生动<sup>②</sup>;而《汉书·苏武传》对于刘向《新序》中苏武事迹的加工改造,就是典型的例子。而班固的功劳,则是在班彪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修订润饰,使人物事迹的叙述,更加具有起承转合的艺术性和完整性。像南朝末年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所谓“班固盗窃父史”,其实是无稽之谈,其原因在于,班氏父子共同依照刘向、刘歆蓝本来结撰《汉书》,其中缘由远比“盗窃父史”来得复杂!

##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iu Xiang、Liu Xin and the Book of Former Han Dynasty WANG Chun-ho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k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ies of ancient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Xiang and Liu Xin (father and son) and the modern version of *Han Shu*. It starts from the important position (the so-called Zong Zheng) occupied by the posterities of the royal Chu family, and the political careers of Liu Piqiang and Liu De, to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of the court that the Liu family had been involved in, and finally to their reflections in the version of *Han Shu* to see how the book was formed and written by the writer under the name of Ban Gu.

**Key words:** the Book of Former Han Dynasty; Liu Xiang; Liu Xin; Ban Gu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嘉祐集笺注》第4卷《衡论》,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第5《前汉书》100卷说:“然识者以固书皆因司马迁、王商、扬雄、歆、向旧文润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间颇多冗琐,良由固之才视数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称述者,岂亦谓有所本欤?”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